

高考改革能否在公平与质量方面取得进展?

■刘海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会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对2012年的期望,宏观一点谈,我还是希望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公平和质量方面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因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面最强调的,一个是质量,一个是公平。

具体来讲,我自己比较关注,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特别是高考改革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教育的质量和公平。高校招生考试是大学教育的一个入口,牵涉到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水平,在招生过程中它又牵涉到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所以它是兼具质量和公平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为整个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或者是对整个中国教育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考改革,不仅受到教育界的关注,也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每年的高考都是一个热点问题。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高考改革一方面要坚持保障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改进。

比如在公平上,我特别希望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升学的政策能够有一定进展。现在社会大众也很关注这一部分。事实上,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不单单包括农民工,也包括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长期工作的白领,他们的子女升学同样遇到了两难的窘境,我们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但是又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跟我的研究直接相关。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面有专门一章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应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改革文件中重视考试招生的一个。因为它对此专门列出一章,而高等教育也只是专列一章而已。这一章里直接提到要“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要专门成立一个国家级咨询机构来指导高考改革实践,说明考试招生改革意义非常重大,也非常重要。原计划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要在2011年成立,但因为各种原因推迟了,但我希望在2012年应该能够成立。

从总体上看,2011年的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学自主招生的联合招考。虽然它不能被称为进步,各界有不同看法。至少高等教育界还是普遍持比较欢迎的态度,因为这一措施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大方便了考生报考,节省了东奔西跑的报考费用;但是一些中学对联考的看法比较不一样,一些人认为其冲击了中学的正常教学,加剧了学生之间的竞争和压力。虽然对自主招生联考的观点相当歧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2011年的一个重要进展。

2012年,我期望能够在长远规划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高考改革,高考制度能够继续为我国保障人才选拔的质量,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钟华采访整理)

我们的课堂能否更具智慧性?

■别敦荣(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在2012年,我们的高等教育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抓住质量问题,尤其是要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题做更新的尝试。目前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问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一些实质性问题有所触及。

这里所说的“实质性问题”,便是如何让课堂教学更具“智慧性”。

课堂教学应该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尽管目前很多高校围绕人才培养,陆续推出了包括“卓越工程师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校企结合改革项目,但这些项目大多还主要通过与实践部门合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定差距。

众所周知,创新型人才除了具备动手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思维,而这方面的训练仅靠实践教学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有课堂教学的支撑。但遗憾的是,现有的课堂教学模式达不到这一要求。

在我看来,真正的课堂教学应该是一个老师和众多学生就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对问题进行争鸣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但我们现在的授课模式却依然是“满堂灌”式的,教学活动中没有任何智慧可言。培养创新型人才,关键是要进入教学过程中,改变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否则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

事实上,对于我所提到的课堂教学模式,目前一些大学的少数教师已经在进行尝试,然而这一过程却非常艰难。我们的相关制度没有配套,一些保守思想和学生的不理解也会给这些教师带来很大压力,这都需要我们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教学过程中的一部分实践教学其实也属于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要相互结合、双管齐下。但近几年人们似乎更加关注实践教学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忽略了课堂教学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我看来,目前国内不管是顶尖大学还是一般高校,在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培养上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新的一年,我并不奢望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希望能够有所起色。

除此之外,对于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改革中的做法,我还想提出一些建议:如果涉及到某项教育改革,我们目前的通常做法是试点—总结—推广。其实这样的方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用,现在却早已落伍了。

早些时候,我国的教育研究刚刚起步,人才匮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今天国内教育研究已经比较发达,研究队伍也十分壮大,因此应该改变原有模式,在进行试点前,将学校实践部门与研究部门结合起来组织前瞻性研究。比如,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理论工作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果能在在此基础上做更具有实践性、政策性的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组织试点改革,效果可能会更好。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回到常识之路有多远?

■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年来,笔者差不多患上了“繁忙症”这个现代社会病,临近年终或者新年,竟然没有明确的知觉,直到编辑提示,方如梦初醒,遂觉得有必要作一点总结了。

过去的一年,我与《中国科学报》(原《科学时报》)续约前缘,每月一次的专栏稿如期出现在《大学周刊》上。现在重读一年来《大学周刊》上的拙稿,发现单之实无甚高论,所谈无一不是常识。

在写“自主招生”何以让人忧虑?时,我意识到长期应试教育形成的惯性正在使原本希望突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自主招生”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高考,结果既不文化,又不“低碳”。而在《当改革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契机出现之后》中,我想在揭示GDP崇拜这种如今大学追求“重科研,轻教学”首要动因的同时,也明确反对那种借“重教学”的名义矫枉过正的企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没有多样性和民族性》绝不是有意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对中国大学由于管理体制和评价标准的单一所造成的日益同质化的担忧。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名言固然是说思想的多样性,但同时把它理解成办学方式的多样,也不算是过度诠释。

《从博导的“低龄化”说起》发表后,据称有人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理解这种情绪。尚在外国希望回国的年轻的准“海归”是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失去直接特聘到国内大学任“博导”的机会。我想,他们太高估评论的力量了。再说,担心自己失去由信息不对称才有的机会就不顾一切地维护现有政策,也说明海外教育实在缺乏力度。实际上,拙文根本不是针对年轻人,我是希望大学教学的各个环节都与“育人”挂上钩,从而让大学真正回归到“教育”的轨道上。

回归“教育”的轨道,不止是教学环节。大学的政策需要精微,需要明确,只有如此才能执行,也才能保持住大学风范,这是《大学政策亟需删繁就简》所要表达的意思。当然,所谓大学风范也不是自己说了就算数的,大学必须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但要让媒体和社会了解大学,就需要大学有相当的透明度。如果社会、媒体或者考生家长是通过大学的自我宣传来了解大学的情况,那么就会离真相越来越远,这是我为什么要写《大学改革需要怎样的舆论支持》的原因。

“求真”本身是从事人文及科学研究学者的常识。但长期的教育已经让我们不习惯于为“求真”而进行批评了。我对南科大的尝试以及一切有益的大学改革都深表支持,但我不认为,只有说廉价的好话才叫支持。《再说南科大的“中国化”》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创造和培养理性的风气,不是胡适所说的“拿证据来”,它的原则都同时闪烁着批评的光彩。

在空中行走,云中漫步,一定畅通无阻;于海底潜泳,俯仰伸展,相当自由自在;梦中一夜,仿佛百年,无论美恶,我自承揽。这是浪漫,不是希望。只有对未来怀揣着希望,才会有批评,只有脚踏实地,批评才有力量。对于中国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提问 2012

岁末年初,是人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最好的时间。

刚刚过去的2011年,国内高等教育大事频发,其中既有曲折、失误,也有探索、成果。于是,人们在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了新的疑问。

2012年,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就此,我们邀请了数位高教领域的专家,请他们畅谈新一年他们最关心的事件是什么,他们最想知道的又是什么。也许,专家的观点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钱学森之问”突破何在?

■卢晓东(北大教务部副部长 元培学院副院长)

个人希望2012年中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在回答“钱学森之问”上有所突破。过去一年,高校在回应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上有一些进展,但仍需要继续从知识论的层面进行探讨与分析。

将课程从单一的讲授课程(lecture)改为讲授课和研讨课(Seminar)两种类型,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重要方面。研讨课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深入的讨论。这种教学并不将既有的知识体系当作确定的结论,而是在师生互相询问和启发之间,把既有知识当作不断进展中的知识进行探讨,这就与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改进的端倪。北京大学在2006年建成小班研讨课教室;最近四川大学谢和平校长在推动小班教学上有重要的价值引导和一些仍有待深入的举措。

与研讨课教学相联系,缩小班级规模,增加师生间在课堂教育中的互动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数据之一。2011年,教育部要求“985”高校公布本科教育质量进展报告,但是核心的质量数据并未呈现出来。2012年,如果能将班级规模纳入该报告,引导高校班级规模向小的趋势发展,将会有效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更新考试模式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知识看作不断推进的洪流而非不可质疑的结论,那么现有的考试内容和模式仍要继续改革。目前,教育部推动的研究生一级学科统考

制度、部分大学推行的考教分离制度和试题库制度都是在构建一种固有的、有标准答案的知识体系,与创新能力培养南辕北辙。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书中提到,“联大中文系的读书报告(和考试)不重抄书,而重有独创性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理平理的想法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期末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免考”。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够培养出众多创新性人才?就是因为学生的创造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被教师们高度地激励与鼓励。

我注意到有些先行改革的高校开始赋予教师很大的考试自主权,这是重要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是有些教师们尚不清楚如何使用。学生写出创造性文章,有些课程只给加5分、10分,这是完全不够的,应该加70分、80分,要将突破和推进知识体系的进步置于学习的核心。

西南联大对“怪论”的鼓励同样提示我们:高考作文的评判要特别鼓励创造性,建议今后增加创造性加分选项。例如,作文满分60分,学生如果有创造性的特别表现,依据程序和权限另行加分,最高建议加30分。实际操作中,创造性加分需要两层审核把关,而加分权重应在50%-100%之间。如此将对基础教育的改革起到卓有成效的引导作用,将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更大范围的发挥出去。

(本报见习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今年会是校车制度建设年吗?

■郭英剑(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新的一年开始,如果说对中国教育有何期望的话,我希望今年成为校车制度的建设、实施年。不说远的,仅2011年11月份以来,国内就发生至少两起重大校车事故:甘肃正宁校车事故死亡20人,另一起发生在江苏,死亡15人。血的教训再一次告诉我们:校车制度建设并实施已刻不容缓。

表面上看,这些事故与高等教育没有直接关系,但那些殒命于车祸中的少年如果无此厄运,也许多年之后就会端坐于大学课堂之中,中国教育的问题相互关联,不会有绝对孤立的存在。

对于频发的校车事故,2011年12月11日,有关部门公布了《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此,我有如下看法:

第一,总体上看,这个条例过于包罗万象,显得不伦不类。既然是有关校车的安全条例,就应该围绕“安全”二字做文章。像如何进行校车服务等,并不是非要在这里加以体现。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问题或可有解?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年,我将继续关注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从教育的发展来说,要真正摆脱高校没有自主办学空间、定位不佳及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必须针对核心问题——去行政化。

2011年,教育去行政化的步伐维艰。一方面是高校去行政化受到较大阻力;另一方面是有些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空有概念,没有实质,甚至只有噱头。如把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视作教育权与学术权分离,这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分离。

怎么解决去行政化问题?我认为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得非常清楚,包括四个方面。

一、切实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招生自主权方面,我希望在2012年能够有大突破。现在的自主招生改革把自主招生和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相嫁接,一个学生只能在自主招生中获取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许多学校拿着自主招生政策去抢生源,而不是真正地去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服务。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根本的方案就是使自主招生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脱钩,赋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具体方案可以包括基于统一高考基础上的学校完全自主招生,或基于联考基础上的学校完全自主招生。

二、切实改变高校校长选拔制度。目前的校长选拔仍是出自行政任命,校长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这导致他们首先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在办学的时候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

在推进校长选拔机制改革过程中,要做到校长职业化,注重考察校长管理学校的业绩。具体地说,真正的职业化将是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因为校长从事研究,可能造成“权力通吃”。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制度,从校长职业化和学术利益回避的方向出发,推动高校行政权与学术权的真正分离。

三、推行学术自治,实施学术本位管理。当前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实际上是以行政为主导,导致学术管理、教育管理出现行政、利益至上的问题,从而滋生教育腐败、学术腐败。

应该把学术管理和教育管理回归到本位上来,通过教师同行评价和建立学术共同体,管理和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与学术贡献;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把学术管理与决策权交给教授委员会。

四、注意学生会的力量,推进学生自治。现在的高校学生会严重异化,异化的实质是高校行政化的继续。学生会会变成类似官场的机构,与利益挂钩。要消除负面影响,必须遏制社会对学生会官僚化、衙门化倾向的影响,回归学生会自治的本质。

(本报见习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能有更透明的大学“记账本”吗?

■侯定凯(华东师大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与传统的象牙塔印象不同,如今我们的高校已经在办学市场化、国际化等方面展示了日益开放的公共形象。然而一个月前由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2010-2011年度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却暴露了一大批高校保守的一面:被调查的112所高校在组织机构设立、制度规范制订、主动公开内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监督和保障制度等五大方面的考评合格率不足四成,没有一所大学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经费预算决算方案和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这一调查结果多少暴露了大学制度设计和实施中的一些痼疾。一流大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居然可以在缺乏办学信息透明度的情况下得以长期维持,这说明个别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的垄断格局依旧在维持。另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被漠视也令人惊讶。虽然《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实施时间不算很长,但一些基本项目上的得分很低,显示出教育法规落实力度和权威性的不足。

信息透明度不足是高校法制化程度低下的一个表征,背后有着办学自主权难以落实等一系列深层、复杂的背景。但无论如何,法规的严肃性需要切实得到维护,公民对于大学办学的基本知情权需要得到伸张。

就中国现状而言,首先需要确立与信息开法规的严肃性相一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负责信息发布机构及其人员的落实、信息公开项目的细化、语言的标准化、规范的格式化、信息公开项目和程序的强制性公示等。另外,需要对现有《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适时提出“修正案”,以便有机会不断纠正原有法规的缺陷,反映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那些剑指世界一流的院校理应在信息公开方面率先垂范。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监督各高校在信息公开制度方面的执行情况,并发布监督结果。

中国的大志存高远,然而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不是口号,而是一组组规范严谨、可以展示的工作程序和数字信息,如同一户持家有方家庭的记账本。期待明年此时,各高校能提交一本本更加透明、全面的“记账本”,让我们看到中国教育法制化的坚实一步!

第二,一些涉及安全的措施过于含混。比如对于校车在路上停上下学生,条例仅说“依靠道路右侧停靠,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由驾驶人将停车示牌伸出车窗,后方车辆应停车等待,不得超越。”问题是:我们现在有统一的停车示牌吗?后方车辆若非要超越,那该如何办?作为条例,应有明确规定。

第三,该法规更多考虑的是城市的校车安全问题,这没有错。但当我们把校车走公交车道当做解决校车安全的途径时,实际上更多解决的是交通拥堵问题。而对校车来说,真正需要的是从安全角度给予其一些“特权”。更为严重的是,条例对于情势复杂的农村校车问题语焉不详,但事实告诉我们,农村的校车安全问题要比城市严重得多。

我心目中的《校车安全条例》,既应该有宏观思想,更应简明扼要,具体方法应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在条例出台后,更应尽快改变有关的交通法规,保障条例既有法可依,也具有法律威慑力。

衷心希望在2012年,我们再也别听到令人心痛的校车事故新闻。